

广元皇泽寺第 28 龕的年代、题材及龕前建筑

——兼唐宝历二年《再修西龕佛阁记》新释

杨筱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006)

内容摘要: 广元皇泽寺第 28 龕是四川北部佛教摩崖造像的代表。借助新刊布考古资料, 比定该龕为 7 世纪初叶造像, 主尊释迦牟尼佛与左右观世音、大势至菩萨组成三尊像。该组合先例见于成都出土的梁天监十五年(516)蔡僧和兄弟造像, 或与刘宋昙无竭所译《观世音菩萨授记经》相关。皇泽寺第 13 龕外层龕左壁唐宝历二年(826)题记载武则天父母曾修“西龕佛阁”, 以往据题刻位置推测其第 13 龕周围, 而从建筑空间和崖壁遗迹看, 其更可能是第 28 龕龕前建筑。

关键词: 广元皇泽寺; 摩崖造像; 释迦牟尼佛; 武则天家族

中图分类号: K87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06(2025)05-0039-13

DOI: 10.13584/j.cnki.issn1000-4106.2025.05.009

On the Dates and Themes of Niche 28 in Huangze Temple in Guangyuan, and the Architecture Outside the Site

——Plu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scription for the Renovation of the Buddhist Pavilion in the Western Niche” from the Second Year of the Baoli Er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YANG Xiao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Abstract: Niche 28 in Huangze Temple in Guangyuan is a representa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Buddhist cliff carvings in north Sichuan. With the aid of newly publishe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the author has confirmed that niche 28 was carved in the early 7th century, and that it houses a triad of sculptures that can be identified as a central Sakyamuni Buddha, Avalokitesvara Bodhisattva on the left, and Mahasthamaprabhata Bodhisattva on the right. An earlier example of this image combination can be found in the Buddhist stele made by the brothers of Cai Senghe in the 15th year of the Tianjian era during the Liang dynasty, which was unearthed from Chengdu, and which was likely associated with the themes of the *Avalokitesvara-bodhisattva-mahasthama-prap-ta-bodhisattva-vyakarana-sutra* (《观世音菩萨授记经》, Sutra of Prediction by Avalokitesvara Bodhisattva) translated by Dhar-modgata in the Song period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he inscription written on the wall to the left of niche 13 dates to the sec-

收稿日期: 2024-09-19

基金项目: 2024 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后计划”“川北地区隋至唐初佛教摩崖造像研究”阶段成果(2024QQJH071)

作者简介: 杨筱(1990—), 女, 湖南省宁乡市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要从事石窟寺考古、佛教图像学研究。

ond year of the Baoli era (826 CE)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nd records that Empress Wu Zetian's parents, Wu Shiyue and Lady Yang, once renovated the "Buddhist pavilion in the western niche." Although it has previously been inferred that the "western niche" was somewhere near niche 13, based on the location of the inscription,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architectural space and cliff remains has revealed that this construction is more likely to be the architecture in front of niche 28.

Keywords: Huangze Temple in Guangyuan; cliff carvings; Shakyamuni Buddha; Empress Wu Zetian and her family

广元皇泽寺摩崖造像现存佛教石窟 57 个,为北魏晚期至唐代所开凿,分布于大佛楼、五佛亭及写心经洞三个区域^[1-2]。其中,第 28 龕(图 1—2)位于大佛楼区崖壁上部,平面马蹄形,敞口尖拱,近似穹隆顶,高 6.86 米,宽 5.55 米,进深 3.60 米。龕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左侧残毁)及龙、阿修罗、乾达婆、迦楼罗等八部众。该龕在皇泽寺不仅规模最大、最为精美,也是四川北部佛教摩崖造像的代表之作。以下,结合近年新刊布的考古材料,讨论第 28 龕的具体年代及题材内容。



图 1 广元皇泽寺第 28 龕 隋末唐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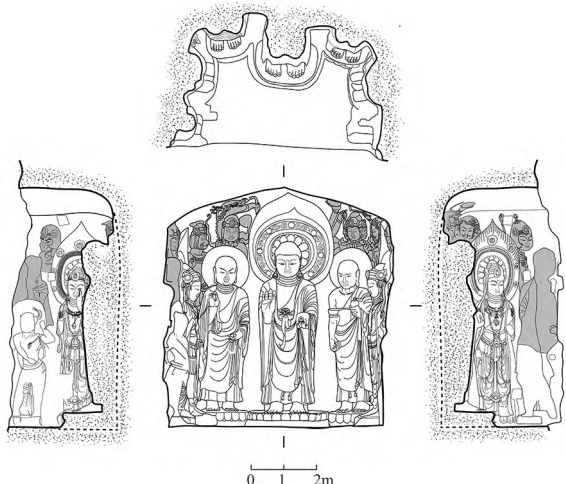


图 2 皇泽寺第 28 龕立面、平面、剖视图

皇泽寺是广元地区武则天信仰的中心,迟至五代十国寺内已有武则天及其家族的祠庙^[3]。现存史料中皇泽寺与武则天家族关联的最早记录,为写心经洞区第 13 龕外层龕左壁唐宝历二年(826)浮雕石碑《再修西龕佛阁记》。碑文记录贞观二年(628)武则天父母武士彠与杨夫人曾于此建“西龕佛阁”。以往依据碑文位置,推测“西龕佛阁”为第 13 龕的周围建筑。从建筑空间和崖壁遗迹来看,“西龕佛阁”为第 28 龕龕前建筑的可能性更大,或为《再修西龕佛阁记》的内容考释提供新思路。

一 造像年代

一般认为皇泽寺第 28 龕开凿于隋至初唐,但对其造像的具体年代尚存不同意见。1990 年,阎文儒撰文认为皇泽寺第 28 龕为隋代大龕^[4],马彦、丁明夷执笔的《广元皇泽寺石窟调查记》判断该龕开凿于唐代^[5]。2004 年,王剑平、杨栋从造像风格出发,推定第 28 龕为隋至唐初贞观造像^[6]。2007 年,王剑平指出该龕为隋代造像可能性更大,或与《续高僧传》中隋末善胃“处蜀道财,悉营尊像”一事有关^[7]。同年,姚崇新发表的《广元唐代石窟造像分期研究》将该龕归为广元唐代第一期第一阶段造像,即武德、贞观作品^[8]。2010 年,金银儿撰文反驳了王氏善胃造像说,借带纪年题刻龕像推拟该龕年代为贞观到高宗前期^[9]。2013 年,八木春生指出从弟子像样式看该龕应为唐初作品,但比已知贞观时期造像保留了更多早期特征,建议考虑为 7 世纪 20 年代造像^[10]。

洞窟完工年代应不早于窟内最晚造像元素出现的年代。皇泽寺第 28 龕中,肌肉隆起的左侧弟子像(图 3)及龙、阿修罗等八部众像(图 4)较为新颖。与左侧弟子像姿态一致、肌肉虬张的例子见于



图3 皇泽寺第28龕 左侧弟子像

皇泽寺贞观时期第56龕^{[2]79}。尊格明确、人形立姿的八部众像以梓潼卧龙山千佛崖贞观八年(634)第2、3龕所见年代较早^[11]。因此,单就现存造像来看,皇泽寺第28龕推定为贞观前后造像较为合

适。然而,皇泽寺第28龕比卧龙山诸龕保留了更多早期造像要素。例如,第28龕菩萨身姿笔直,周身装饰璎珞,更接近广元地区出土的北周刘约造像碑菩萨像、绵阳开元寺出土的北周至隋菩萨像。卧龙山千佛崖第2、3龕菩萨身躯呈S形站姿,与贞观四年(630)茂县点将台第1、6龕菩萨相似^[12],为唐初新风格的代表。这一情况暗示着皇泽寺第28龕或为同类作品中引领风气之先者,造像年代或略早于贞观初年的卧龙山、点将台,为7世纪初叶隋末唐初作品。

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皇泽寺第28龕受到了南、北两个方向即成都和长安的影响^{[7]596[10]151}。然而,现有讨论多集中于单一尊像、单一元素,对造像组合和表现技法少有讨论。皇泽寺第28龕中,以高浮雕表现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等;以浅浮雕表现龙众、阿修罗及其他八部众。这一设计的基础框架,即借助高浮雕、浅浮雕区分主要人物与背景人物,罕见于中原北方的石窟及造像,但普遍流行于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背屏式造像。如,成都西安路出土的中大通二年(530)比丘晃藏造释迦像(图5)^[13]。资阳市乐至困佛寺北周第19龕(图6),于龕内后壁浅浮雕弟子群像,或为这一技法从背屏式造像向石窟摩崖迁移的早期产物^[14]。皇泽寺第28龕及卧龙山第2、3龕为代表的四川北部贞观时期摩崖造像,以八部众像取代了弟子像,但完整地保留了主要人物与背景人物的双层结构和



1



2

1. 左侧;2. 右侧。

图4 皇泽寺第28龕 八部众像



图5 成都西安路出土晃藏造释迦像 梁中大通二年(530)
(采自《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图版 56-1、图 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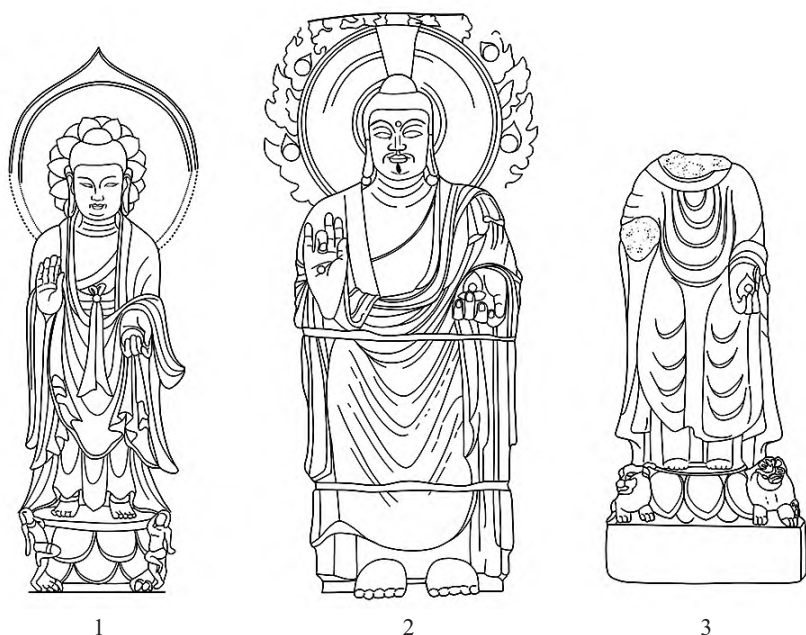
图6 资阳市乐至困佛寺第19龕 北周

高、浅浮雕并用的技术特征。如前所述,皇泽寺第28龕为川北地区同类摩崖造像首开风气者,其与成都出土南朝背屏式造像之间的承继关系,尤为值得关注。

二 主尊释迦牟尼佛

皇泽寺第28龕中,左侧菩萨宝冠中有化佛,右侧菩萨宝冠中有宝瓶,分别被认定为观世音、大势至。此二菩萨多与阿弥陀佛构成“西方三圣”组合,故一般认为第28龕主尊为阿弥陀佛^{[1]46[5]29[6]65[7]596[15]}。金银儿指出该龕主尊左手持宝珠、右手施无畏印,已知12例同类造像中有3例尊格明确,皆铭释迦,需考虑该尊为释迦牟尼佛^{[9]100-102}。金氏的观点具有启发性,但未梳理此类佛像的造像谱系,实例遗漏较多,需再次考察。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左手持宝珠、右手施无畏印的佛像,共计46例(表1)。第一类为立像,共计14例。根据袈裟搭着方式的不同,分为三组。第一组为上衣搭肘式,即上衣自身后覆两肩,右衣角自胸前横过搭于左肘。共有3例,皆见于成都地区出土南朝背屏式造像,即万佛寺出土的梁中大通五年(533)上官法光造释迦像、川博3522号及商业街出土的90CST⑤:7号(图7:1)。第二组为中衣搭肘式,着袒右式上衣,下层中衣覆肩、右衣



1. 上衣搭肘式 成都商业街出土南朝背屏式造像 90CST⑤:7 号主尊;
2. 中衣搭肘式 麟游慈善寺初唐第 2 窟正壁主尊;
3. 通肩式 西安尤家庄出土北周保定三年(563)符道洛造佛立像。

图 7 左手持宝珠、右手施无畏印佛立像

角垂搭右肘。集中于初唐,见于麟游慈善寺第 2 窟正壁(图 7:2)及广元皇泽寺第 20 龕、千佛崖第 710 龕。第三组为通肩式,绝大多数出自西安周围,年代自北周至唐代,部分 U 型领口较大。西安尤家庄出土北周保定三年(563)符道洛造佛立像

(图 7:3)、上海博物馆藏北周大象二年(580)周纪仁造释迦像、宝鸡岐山出土隋开皇十二年(592)王贤良造释迦像 3 例纪年明确。另有广元地区 2 例,即皇泽寺隋末唐初第 28 龕、千佛崖盛中唐第 197 龕。

第二大类为坐像,均结跏趺坐,共计 32 例。根

表 1 左手持如意宝珠、右手施无畏印佛像统计表

身姿	袈裟搭着	造像实例	资料出处
第一类立像	1.上衣搭肘式	成都万佛寺出土梁中大通五年(533)上官法光造释迦像	四川博物院等《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图版 32-1,中华书局,2014 年
		成都万佛寺出土南朝背屏式造像川博 3522 号主尊	前揭《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图版 34-1
		成都商业街出土南朝背屏式造像 90CST⑤:7 号主尊	前揭《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图版 48-1
	2.中衣搭肘式	麟游慈善寺初唐第 2 窟正壁主尊	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等《慈善寺与麟溪桥:佛教造像龕调查研究报告》,彩版五,科学出版社,2002 年
		广元皇泽寺初唐第 20 龕主尊	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等《广元石窟内容总录·皇泽寺卷》,第 39 页,巴蜀书社,2008 年
		广元千佛崖初唐第 710 龕主尊	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等《广元石窟内容总录·千佛崖卷(下)》,第 286 页,巴蜀书社,2014 年

表 1(续)

身姿	袈裟搭着	造像实例	资料出处
第一类立像	3.通肩式	西安尤家庄出土北周保定三年(563)符道洛造佛立像	岳连建《西安北郊出土的佛教造像及其反映的历史问题》,《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3期
		上海博物馆藏北周大象二年(580)周纪仁造释迦像	季崇建《上海博物馆藏纪年佛教造像考证》,《上海博物馆集刊(第8期)》,第217—243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
		西安碑林藏北周至隋代佛立像	西安碑林博物馆《长安佛韵: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艺术》,第106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宝鸡岐山出土隋开皇十二年(592)王贤良造释迦像	庞文龙《岐山县博物馆藏隋代石造像》,《文物》1991年第4期
		西安碑林藏隋代佛立像	前揭《长安佛韵》,第108页
		西安王前村出土盛唐佛立像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文物精华·佛教造像》,图版168,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
		广元皇泽寺隋末唐初第28龛主尊	前揭《皇泽寺卷》,第46页
		广元千佛崖盛中唐第197龛主尊	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等《广元石窟内容总录·千佛崖卷(上)》,第286页,巴蜀书社,2014年
第二类坐像	1.上衣搭肘式	成都万佛寺出土梁普通六年(525)释迦像	前揭《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图版31-1
		庆阳北石窟寺北周第240窟南壁大龛主尊	甘肃北石窟寺文物保护研究所《庆阳北石窟寺内容总录》,图版244,文物出版社,2022年
		广元皇泽寺北周至隋代第15龛主尊	前揭《皇泽寺卷》,第30页
	2.上衣重层式	成都万佛寺出土南朝背屏式造像川博3527号主尊	前揭《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图版35-1
		成都万佛寺出土初盛唐佛坐像	刘志远、刘廷璧《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第18页,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
		巴中东龛初唐第1龛主尊	雷玉华、程崇勋《巴中石窟内容总录》,第333页,巴蜀书社,2006年
		广元皇泽寺初盛唐第39、43龛主尊	前揭《皇泽寺卷》,第71、75页
	3.中衣搭肘式	广元千佛崖盛唐第213、309、452、744龛主尊	前揭《千佛崖卷(上)》,第204、306页;前揭《千佛崖卷(下)》,第41、319页
		广元皇泽寺中唐第16龛主尊	前揭《皇泽寺卷》,第35页
		广元千佛崖中唐第198、383龛主尊	前揭《千佛崖卷(上)》,第180、370页
		巴中南龛第69龛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党守业造释迦像	前揭《巴中石窟内容总录》,第103页
		巴中南龛第71龛唐开元二十八年张令该造释迦像	前揭《巴中石窟内容总录》,第108页
		巴中南龛盛唐第17、42、47、50、53、54、70、77、91、99、105龛主尊	前揭《巴中石窟内容总录》,第33、69、73、76、79、82、107、117、144、153、161页
		巴中南龛盛中唐第39龛主尊	前揭《巴中石窟内容总录》,第65页
		巴中北龛盛唐第30、34龛主尊	前揭《巴中石窟内容总录》,第239、245页
		巴中西龛盛唐第31龛主尊	前揭《巴中石窟内容总录》,第279页



1. 上衣搭肘式 成都万佛寺出土梁普通六年(525)释迦像;
2. 上衣重层式 成都万佛寺出土南朝背屏式造像川博 3527 号主尊;
3. 中衣搭肘式 巴中南龛第 69 龛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党守业造释迦像。

图 8 左手持宝珠、右手施无畏印佛坐像

据袈裟搭着方式的不同,细分为三组。第一组上衣搭肘式,见于成都万佛寺出土的梁普通六年(525)释迦像(图 8:1)、庆阳北石窟寺北周第 240 窟南壁大龛、广元皇泽寺北周至隋第 15 龛。第二组上衣重层式,即于上衣搭肘式外再披一重上衣,包括万佛寺南朝背屏式造像川博 3527 号(图 8:2)、初盛唐佛坐像,巴中东龛初唐第 1 龛及广元皇泽寺初盛唐第 39、43 龛。第三组为中衣搭肘式,皆见于盛中唐时期广元、巴中。广元千佛崖 6 例,皇泽寺 1 例;巴中南龛 14 例(图 8:3),北龛 2 例,西龛 1 例。此外,左手持宝珠、右手施无畏印亦见于倚坐佛像。如,万佛寺出土盛唐佛坐像^[16]、巴中南龛盛唐第 118 龛及第 27 龛主尊佛像。此 3 例作品出现年代较晚,袈裟各不相同,且皆出自持宝珠、施无畏印大量流行的造像群或摩崖遗址,或属于零星借用周围造像流行持物、手印,非统一、稳定的造像样式,故不纳入讨论。

以上实例,集中于四川、陕西、甘肃地区。无论是立像还是坐像,目前所见最早实例都出土于成都万佛寺遗址,即中大通五年上官法光造释迦像和普通六年释迦像。北朝地区所见最早的实例为保定三年符道洛造佛立像。左手持宝珠、右手施无

畏印的佛像应从四川向陕西、甘肃传播。位于川陕甘交界处的广元地区为这一图像流布的重镇,皇泽寺第 28 龛主尊佛像为其传播的关键节点。该龛主尊面形方圆,内着袒右僧祇支,胸前系带结节,垂于袈裟上,整体表现与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背屏式所见同类造像相似。如,商业街出土的 90CST⑤:7 号主尊可作为比对实例。第 28 龛主尊戴耳铛,头光内部圆形、外部桃形,装饰卷草及火焰纹,与皇泽寺北周至隋代第 15 龛主尊相仿。后者与第 28 龛处同一遗址、时代更早,或为上述细节的直接来源。又,第 28 龛主尊所着袈裟虽领口较大,但确采用了北朝时期即已盛行于西安地区佛立像实例的通肩式袈裟。由此可知,第 28 龛除去继承四川地区本土传统外,也吸纳了关中地区同类造像的典型要素,为南、北两个方向造像传统融合的产物。

佛陀所持宝珠名为如意宝珠或摩尼宝珠,是佛教中较为常见的装饰和持物。据鸠摩罗什所译《大智度论》卷 59,如意宝珠或云出自龙王脑中,或云帝释天战阿修罗所遗金刚碎片,或云过去佛舍利所变,或云众生福德自有此珠,且可满足众生一切愿望^[17]。因此,单从持宝珠这一特征,难以直

接考订佛像尊格。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上述例子中明确提及尊格造像记有 6 例,皆铭释迦牟尼佛,即普通六年释迦像、大中通五年上官法光造释迦像、大象二年周纪仁造释迦像、开皇十二年王贤良造释迦像、巴中南龛第 69 龛开元二十八年(740)党守业造释迦像及第 71 龛开元二十八年张令该造释迦像。此外,万佛寺出土南朝背屏式造像川博 3522 号,背面中间阴刻大字一行,“□(释)迦牟尼文佛”^{[13]95-98}。阴刻大字性质不明^①,难以确认是否为原初造像记,但该像正面背光表现有比丘绕棺场景,应与涅槃关联,或可佐证主尊为释迦牟尼佛。上述带铭文实例虽数量有限,但尊格统一,坐、立像各有代表,涵盖了此类佛像流行的主要区域和时代。这一情况暗示着以左手持宝珠、右手施无畏印为释迦牟尼佛的认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皇泽寺第 28 龛主尊于这一造像谱系中处于中心位置,确需考虑其尊格为释迦牟尼佛。



图 9 成都下同仁路出土梁天监十五年(516)
蔡僧和兄弟造像
(采自《成都下同仁路佛教造像坑及城市生活遗址
发掘报告》彩版 48)

三 与观世音、大势至菩萨的组合

金银儿认为皇泽寺第 28 龛受到“本迹二门”观念影响,出现了释迦牟尼佛、无量寿佛互通的情况,以理解释迦牟尼与观世音、大势至的组合问题^{[9]100-102}。金氏主张的“本迹二门”之说义理上能否成立、相关义理又如何得以影响皇泽寺造像,恐需更多线索论证。不过,释迦牟尼与观世音、大势至并处一龛,并非全无他例。成都出土南朝造像及豫、陕、川等地唐前期石窟见有多例类似组合。因此,与其考虑该龛中出现了释迦牟尼、无量寿的互通,不如考虑该龛为释迦牟尼与观世音、大势至的三尊像组合。

成都市下同仁路窖藏出土的梁天监十五年(516)蔡僧和兄弟造像,即 H3:11 背屏式造像(图 9)。正面为一立佛、二弟子、四菩萨、二力士,背面中上部浅浮雕一交脚菩萨,端坐天宫之中,下部为造像记:“梁天监十五年,岁次丙申,月维孟春,佛弟子蔡僧和兄弟,奉为亡考别驾亡妣易夫人,爰及亡弟比丘僧珍,建造释迦牟尼尊像一丘,并弥勒、观音、势至并诸侍者……”^[18]罗玲指出从图像特征来看,正面立佛左、右内侧菩萨立于莲台,区别于外侧持拂尘的二菩萨,构成三尊像组合。与之对应,造像记中释迦牟尼尊像为正面立佛,弥勒为背面交脚菩萨,观音、势至为正面立佛左、右胁侍菩萨^{[19]②}。皇泽寺第 28 龛与成都地区出土的此类南朝背屏式造像在造像组合、样式上都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因此,第 28 龛确有可能延续了蔡僧和兄弟造像中释迦牟尼、观世音、大势至的组合。

唐前期佛教石窟龛像中,另有 3 例类似组合。龙门石窟第 1387 窟南壁题记 1716 号“显庆四年

① 此件造像背面阴刻大字下部另有十二行阴刻小字,为唐元和十年(815)补刻铭文。从现有线索来看,难以确认上部大字为原初造像题刻,还是隶属唐代补刻铭文。

② 此稿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易丹韵博士提供。

(659)四月七日比丘僧义敬造释迦像一区,观音、大世上(大势至),为师僧父母,法界众生,共同思福,一时供养”^[20]。彬县大佛寺第23窟西壁长安二年(702)彭城县主武氏及其丈夫李齐敬造“释迦象一铺,观音菩萨一、势至菩萨一”^[21]。通江千佛崖第35龕外层龕左壁中部开元七年(719)造像记“弟子王珣造释迦牟尼佛一身,大世智(大势至)菩萨、观音菩萨各一身”^[22]。皇泽寺第28龕与龙门石窟显庆四年造像年代相近,与通江千佛崖第35龕同处川北地区。彬县大佛寺长安二年造像赞助人彭城县主武氏,实为武则天堂侄女。如下讨论,武则天父母极有可能与皇泽寺第28龕窟前建筑的营建关联。以上3例虽开凿略晚于皇泽寺第28龕,但皆与第28龕存在间接关联,可作为讨论该龕造像题材的旁证。

释迦牟尼、观世音、大势至的组合应与刘宋昙无竭所译《观世音菩萨授记经》关联^{[19]8-10}。该经属于观世音授记类经典,宣言观世音、大势至过往身世及其于阿弥陀佛涅槃后将次第成佛。其云,过去金光师子游戏佛国有威德王及二童子宝意、宝上,诣彼国佛所,请教何为最上供养,彼国佛陀答以发菩提心、广济众生,二童子因此立下“修行菩提道”“大悲度众生”的誓愿。释迦牟尼佛云,威德王即今我身,宝意、宝上即观世音、大势至^[23]。昙无竭,又名法勇,幽州黄龙人,永初元年(420)曾西行天竺,后留居南朝宋,“其所译出观世音受记经,今传于京师(即建康)”^[24]。罗玲指出蔡僧和兄弟造像中出现与《观世音菩萨授记经》相关的释迦牟尼、观世音、大势至组合,反映了建康地区佛教译经对四川佛教造像的影响^{[19]10-11}。与该经有关的另一造像是成都商业街出土的北齐建武二年(495)法明造“观世音成佛像”^{[13]130-133}。肥田路美认为此处“观世音成佛像”与《观世音菩萨授记经》等宣扬的观世音成佛思想相关^[25]。需要指出的是,蔡僧和兄弟造像和皇泽寺第28龕中释迦牟尼与观世音、大势至的组合并不以观世音信仰为中心。《观世音菩萨授记经》除去观世音成佛信仰以外,另一核心内容是解释观世音、大势至菩萨为何可以自西方净土至娑

婆世界、追随释迦牟尼佛,从而调和观世音、大势至信仰中净土因素与救苦性质分属两个世界的矛盾^[26]。释迦牟尼与观世音、大势至的组合,旨在宣扬观世音、大势至追随释迦牟尼,于娑婆世界救济众生,强调大乘佛教菩萨行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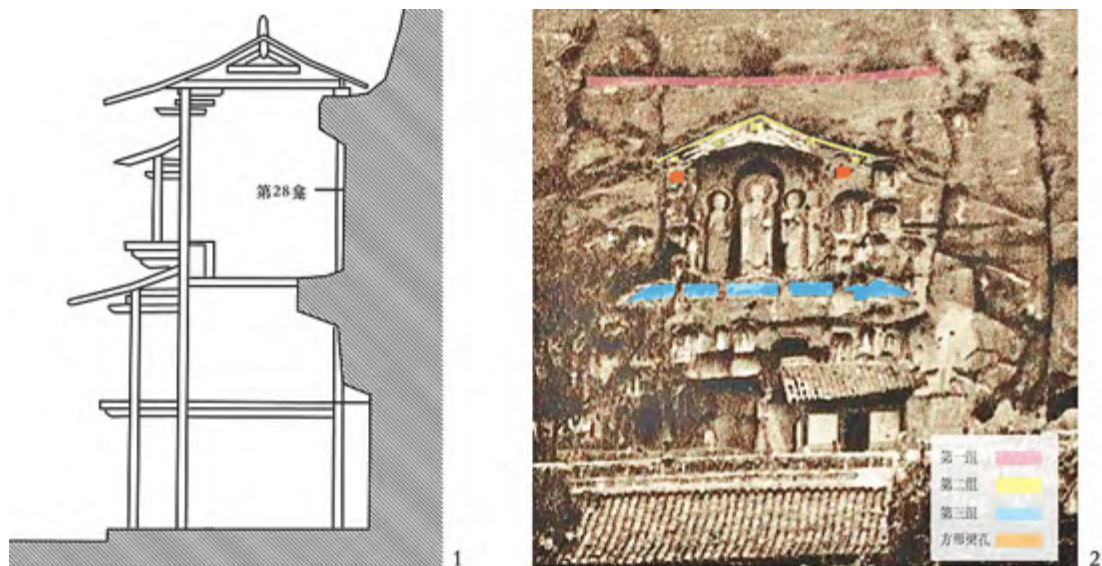
四 龕前建筑与“西龕佛阁”

皇泽寺第28龕为单层敞口龕,进深较浅,内部造像缺少必要遮挡,力士立于龕口两侧,设计之初应考虑外接木构楼阁以遮蔽风雨。20世纪初的历史照片(图10)中,皇泽寺第28龕周围崖壁尚可分辨多组凿孔,为讨论早期窟前建筑提供了一些线索^[27]。相关建筑遗迹,可分为三组(图11—12)。第一组,第28龕上部有一跨度较大的长横槽,覆盖了今大佛楼中心区域的大部分造像。现代仿古建筑修建时仍利用这一横槽排水,倚崖壁设计了歇山顶、“正面向前”的三层楼阁,或可作为参考^[28]。第二组,第28龕龕顶边缘保留了多次叠压的沟槽和棹孔,应存在多次修建活动。最内侧的沟槽上开凿有5个棹孔,以龕尖为中心,左右各2个,等距分布,暗示第28龕前曾修建“山面向前”的人字坡龕檐或木构楼阁。第三组,第28龕底部及其左、右两侧各有一段横长方形方槽,基本处于同一高度。这一组方槽位于崖壁上部以第28龕为核心的造像群与下部第33—43龕之间,原本外



图10 恩斯特·柏石曼拍摄大佛楼区造像

(采自 *Baukunst und Landschaft in China*, 第111页)



1.现代建筑(据《广元皇泽寺文物保护维修工程报告》第178页改绘);
2.建筑遗迹(据Baukunst und Landschaft in China,第110页改绘)。

图11 皇泽寺第28龕崖壁建筑遗迹示意图



图12 皇泽寺第28龕周围建筑遗迹示意图

部建筑应于此分为上、下两层。因此,尽管无法复原最初建筑结构,但从崖壁现存遗迹来看,第28龕龕前建筑应至少具有两层,且经多次重修。此外,第28龕左、右侧各有一尺寸较大的方槽,二者大体处于同一高度,为一组梁孔。高宗武周时期开凿的第17、20龕明确避让了左侧梁孔,方槽应开凿于高宗武周之前,可帮助推断第28龕龕前建筑

出现的时代。

写心经洞区第13龕外层龕左壁有一浮雕石碑,刊刻《再修西龕佛阁记》(图13)。从现场痕迹来看,这一碑文应为磨去原有题刻后重新篆刻,末尾有宋人加缀大字题刻。其下部磨损严重,字迹难辨,幸为清代多种金石学著作收录,内容大部分可



图 13 皇泽寺第 13 龕唐宝历二年(826)
《再修西龕佛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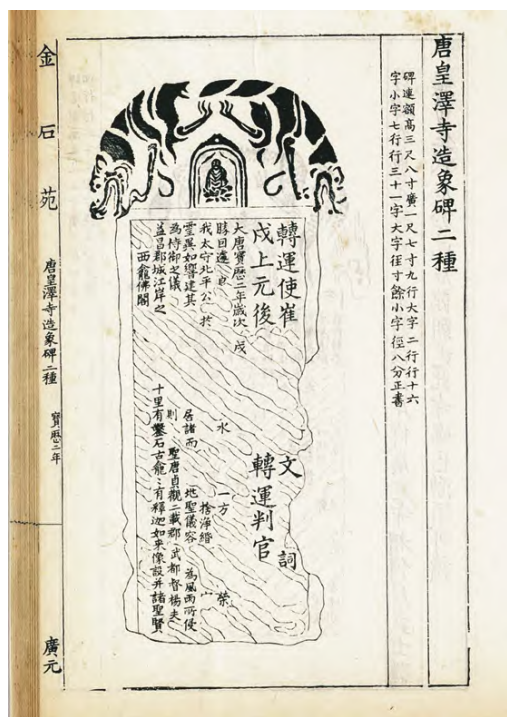


图 14 《再修西龕佛閣記》摹本
(采自清刘喜海撰《三巴县志》道光二十八年序来凤堂本)

考。现以刘喜海《三巴县志》^①(图 14)^[29]及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30]二种,合校录文:

再修西龕佛閣記

益昌郡城江岸之□□□□十里有凿石古龕:有释迦如来像设并诸圣贤/为侍卫之仪□□□□□□□□则□□。圣唐贞观二载,郡

□武都督杨夫□/灵异如响,建其□□□□□
□□居诸而□□□兆圣仪容□□为风雨所
侵。/我太守北平公崔于□□□□□□□□
□□□□□舍净缙□□□□□/胜因,遂令
良工□□□□□□□水□□□□一方□□□
□□荣。

大唐宝历二年岁次□□□□□□日□

马彦、丁明夷认为碑文表明“武氏夫妇凿‘□圣仪容’,正在都督任上。迨至敬宗宝历年间,该处称西龕,建有佛阁,并续凿造像”^{[5]27}。姚崇新认为武氏夫妇凿修古龕并佛阁,宝历二年北平公为之布施良财,令工匠再次修葺。“西龕”之名应与皇泽寺位于州城之西有关。皇泽寺写心经洞区的第 12、13 龕距离其他龕窟造像较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古龕应为第 12、13 龕,“西龕佛阁”为与第 12、13 龕连接的木构建筑^{[8]441-442}。姚氏从地理位置解读“西龕”之名,契合这一时期摩崖造像的称名习惯,然“凿石古龕”及“西龕佛阁”的具体位置仍需进一步考虑。

从《再修西龕佛閣記》的题名来看,碑文内容应与“西龕佛阁”的两次修建有关。单就残碑现存“灵异如响”“建其”等词句,难以判断武氏夫妇是否直接参与了该龕的修造,然二人至少应与窟前佛阁的修建有关,才有北平公崔某“再修”之事。南北朝至唐代文献之中,佛教寺院中楼阁皆为高大的多层建筑^[31]。南北朝时期,建邺正观寺有“重阁层门,殿堂整饰”^[32]。隋唐时期,佛寺楼阁可高百尺,为寺院及城市重要的景观建筑。佛阁内部常设巨大佛像,可登阁观像。如,五台山佛光寺中,有“三层七间弥勒大阁,高九十五尺”^[33]。圆仁曾于太原开元寺,“上阁观望,阁内有弥勒佛像,以铁铸造,上金色。佛身三丈余,坐宝座上”^[34]。就考古发

① 《金石苑》是刘喜海所撰系列金石著作的总名,《三巴县志》为正式名称。封面镌“道光丙午(1848)夏日燕庭题于来凤堂”,善本现藏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王家葵《刘喜海〈金石苑〉考略》,《中国书法》2018 年第 8 期,第 4—13 页。

现而言,佛阁建筑亦多与摩崖大龕结合。宿白先生指出南京栖霞山千佛岩大龕、新昌宝相寺大龕为依山镌刻,露顶开龕,接连木构。这种摩崖大龕兴建之初虽可能受到云冈石窟影响,但其竣工之后又反过来影响了中原北方^[35]。这类依山修建、以大龕为中心的巨型佛阁还见于太原龙山童子寺^[36]、蒙山开化寺^[37]及敦煌莫高窟窟前建筑遗迹^[38]。因此,《再修西龕佛阁记》中提及的“西龕佛阁”恐怕不是小型建筑,而是体量较大的多层殿堂式建筑,且与摩崖大龕组合的可能性较大。

就皇泽寺而言,写心经洞区第13龕虽与题刻位置接近,但其周围不仅没有相关建筑遗迹,也没有符合条件的建造空间。大佛楼区以第28龕为中心的龕前建筑是皇泽寺中唯一保留了明确建筑遗迹、符合修建像阁一体建筑的位置。“西龕佛阁”两次工程的施主都为州郡之主政,修建或修缮寺院中主要龕像相关的大型建筑的可能性也远大于其他中小型石龕的关联建筑。武氏夫妇修造佛阁为贞观二载,龕内主尊为释迦如来像,暗合了上文对该龕年代、题材的讨论。因此,与其将“西龕佛阁”比定为第12、13龕周围的木构建筑,不如考虑其与第28龕龕前多层木构楼阁的关系。又,唐代石窟中有不少题刻与其关联工程相对距离较远的例子。最为相似是龙门石窟的《大唐内侍省功德之碑》,尽管碑文距离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龕尚有一定距离,但多数学者认为其所述造像应即补刻在奉先寺大像龕龕内的等身佛立像^[39]。写心经洞第13龕位于今大佛楼右前方,龕像为唐初贞观时期开凿。北平公崔某修缮佛阁之时,利用早期龕像的造像记碑刊刻《再修西龕佛阁记》实不违背常理。

五 结 语

借助造像组合考察佛像尊格,是一种通行的图像认定方式。结合题刻位置分析文本内容,也是理解碑文题刻常见思路。但是,这些分析路径也容易出现先入为主的情况,以致忽略了佛教石窟及造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佛教石窟及其造像作为

宗教实践的产物,尤需结合遗迹现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皇泽寺第28龕与成都地区南朝背屏式造像存在明显的承继关系。对皇泽寺第28龕题材的讨论,不能忽略南朝佛教背屏式造像中已出现的释迦牟尼、观世音、大势至组合。《再修西龕佛阁记》题刻附近缺少修建大型佛阁建筑的空间条件,第28龕崖壁周围又确存在“依山修造,为大佛而设”多层佛阁的建筑遗迹。武氏夫妇修造“西龕佛阁”为第28龕龕前建筑可能性更大。若上述讨论成立,皇泽寺第28龕作为7世纪初叶川北地区摩崖造像引领风气之先者,不仅生动地映现了四川地区南朝佛教造像传统向唐代石窟摩崖的变迁,还因与武则天家族的密切关联而成为重要的历史物证,为追索广元地区武则天信仰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基点。

后记:文中未标注出处的图片均为本人摄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研究员协助制作了皇泽寺第28龕及周边三维模型,广元石窟研究所王剑平、舒灵扬、杨星为现场工作提供支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李静杰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利群研究员对论文写作给予指导。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 [1]四川省文物管理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 广元石窟内容总录:皇泽寺卷[M]. 成都:巴蜀书社,2008:8.
- [2]罗宗勇,王剑平. 四川广元皇泽寺新发现的唐代石刻摩崖造像[J]. 文物,2009(8):72.
- [3]张明善,黄展岳. 四川广元县皇泽寺调查记[J]. 考古,1960(7):54.
- [4]阎文儒. 四川广元千佛崖与皇泽寺[J]. 江汉考古,1990(3):90.
- [5]广元市文物管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佛教所. 广元皇泽寺石窟调查记[J]. 文物,1990(6):29,33.
- [6]王剑平,杨栋. 广元皇泽寺28号窟时代考证[J]. 四川文物,2004(1):65.

- [7]王剑平. 广元皇泽寺 28 号窟时代续考:兼论其造像艺术风格及源流[C]// 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 2005 年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594-595.
- [8]姚崇新. 广元唐代石窟造像分期研究[J]. 考古学报,2007(4):440.
- [9]金银儿. 四川省广元皇泽寺第二八窟について[J]. 美術史,2010(1):92-98.
- [10]八木春生. 广元皇泽寺初唐造像考[J]. 李梅,译. 中国国家美术,2013(3):151-152.
- [1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绵阳市文物局. 绵阳龛窟:四川绵阳古代造像调查研究报告集[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134-152.
- [1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茂县博物馆. 四川茂县点将台唐代佛教摩崖造像调查简报[J]. 文物,2006(2):41,46.
- [13]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博物馆. 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M]. 北京:中华书局,2013:157.
- [14]雷玉华. 四川中部首次发现北朝佛教摩崖造像[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9):62.
- [15]员安志,侯正荣. 四川广元县皇泽寺石窟调查纪要[J]. 考古与文物,1985(1):50-54.
- [16]刘志远,刘廷璧. 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M]. 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18.
- [17]龙树菩萨. 大智度论[M]// 鸠摩罗什,译. 高楠顺次郎,等.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25 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478.
- [18]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成都下同仁路:佛教造像坑及城市生活遗址发掘报告[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56,彩版 48.
- [19]羅玲. 成都市下同仁路出土「梁天監十五年」銘背屏式佛教造像について[J]. 美術史研究,2017(55):4-8.
- [20]刘景龙,李玉昆. 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下[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400.
- [21]常青. 彬县大佛寺造像艺术[M]. 北京:现代出版社,1998:130.
- [22]白彬,谈北平,郭振新,等. 四川通江诺江镇千佛岩摩崖造像调查简报[J]. 敦煌研究,2020(6):76.
- [23]佚名. 观世音菩萨授记经[M]// 昙无竭,译. 高楠顺次郎,等.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12 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356-357.
- [24]慧皎. 高僧传:昙无竭[M]// 高楠顺次郎,等.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0 册[M].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338-339.
- [25]肥田路美. 四川で出土した南北朝時代の仏教石像をめぐって[G]// 濱田瑞美. アジア仏教美術論集 東アジアⅠ(後漢・三国・南北朝). 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17:255-259.
- [26]李利安. 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235-241.
- [27]Ernst Boerschmann. Baukunst und Landschaft in China: Eine Reise durch Zwölf Provinzen[M]. Berlin:Verlag von Ernst Wasmuth A.G.,1923:110-111.
- [28]皇泽寺博物馆. 广元皇泽寺文物保护维修工程报告[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5-10,171.
- [29]刘喜海. 三巴耆古志[M]// 刘喜海. 金石苑. 成都:巴蜀书社,2018:313.
- [30]陆增祥. 八琼室金石补正[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492.
- [31]王贵祥. 隋唐时期佛教寺院与建筑概览[J]. 中国建筑史论汇刊,2013(2):3-64.
- [32]僧祐. 出三藏记集[M]. 苏晋仁,注解. 北京:中华书局,1995:552.
- [33]赞宁. 宋高僧传[M]. 范祥雍,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7:695.
- [34]圆仁.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M]. 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9:312.
- [35]宿白. 南朝龛像遗迹初探[J]. 考古学报,1989(4):389-412.
- [3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太原市龙山童子寺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2010(7):54-56.
- [37]李裕群. 中国:唐规模最大的佛阁再现真容:太原蒙山开化寺佛阁遗址发掘(2015—2016 年度)[N]. 中国文物报,2017-3-10(5).
- [38]潘玉闪,马世长. 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48-54.
- [39]李晓霞,谷宏耀. 龙门石窟《大唐内侍省功德之碑》相关问题再考[J]. 敦煌研究,2018(6):66-67.